

# 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五倫國際關係論》的規範理論建構<sup>1</sup> ——隋朝「漢胡和親」下〈夫婦倫〉的倫理秩序解析——

張 啟雄

## 要旨（日本語）

これまで、真の中国の国際関係は、一般に精確には知られておらず、John King Fairbankの*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と題する著作の影響を受けて、中国の外交関係は朝貢体制に矮小化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る。実は、中国の伝統的な国際関係は「五倫国際関係論」である。

五倫国際関係とは何か。それ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という五倫関係であり、そのパラダイムは「義親別序信」という「君臣義あり、父子親あり、夫婦別あり、兄弟序あり、朋友信あり」である。

小論は、その中の「夫婦倫」を取り上げて隋王朝の対外関係を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

開皇二年（582年）、阿爾泰山を拠点とする突厥沙鉢略可汗は諸部族を率いて南下し、南方に新しく建てた隋王朝に撃破されたため、内争となり、遂に東西兩汗國に分裂した。隋文帝はこの機会に乗じて、和親政策を採り、東突厥沙鉢略可汗と連合して西突厥と対抗していた。東突厥汗は隋公主を妻に娶り、隋文帝に「辰年九月十日（正朔を奉じ）、皇帝是婦（姫）父，即是翁（舅），此（東突厥）是女（娘）夫，即是兒（婿）例……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繪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翁婿之邦」と上奏した。文帝は「（帝）既是沙鉢略婦公，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と応えた。さらに、東突厥の羊馬と隋王朝の絹との交易により、それらは共有のものとなった。即ち「宗藩共同体」となったのである。「宗藩共同体」となってから、隋文帝は聖人可汗と称し始めた。

隋の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榆林に巡幸し、東突厥啓民可汗及び義成姫が来朝し、前後に馬三千匹を献上した。煬帝は大いに悦び、絹一万三千段を恩賜した。啓民可汗がさらに表文を献上した。曰く：「至尊（煬帝）今還（なお）聖人の先帝が如し、天下四方の可汗を捉えてここに坐させた。また臣（啓民）及び突厥の百姓を養い、実に短少するものはなし。臣は今まで聖人及び至尊に養って頂いたことを回想するに、上奏しても意を尽くせないことが多い」と言うように、隋の煬帝は「至尊可汗」と尊称された。

隋王朝は、華夷和親を通じて「夫婦倫」の倫理をパラダイムとして、「夫婦之邦」を打ち建てたのは、その時代を支配する規範的な考え方であっただろう。しかし、歴代の姫が最も適応し難くなる点は、西域の遊牧民族には「父死子継、兄終弟及」たる「子妻群母」という「收継婚制」があったことである。儒教の教化を受けた姫にとって、それは

1 本文原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之個別型研究計畫，其後應國立政治大學頂尖大學研究計畫之邀，參與唐宋變革研究團隊，獲益良多。

「不倫」であるため、遭うたびに「帰国」を皇帝に上奏していても「その風俗に従う」べきとの命令を下した。恐らくこれも中国の〈以不治治之論〉のもとに、「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俗制宜」という「民族自治」的な国際秩序原理によるものと思われる。それによって、「和親」の姫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という諺に従って生涯を通して他国に永駐する「終生大使」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 一、緒 論

不同的文化價值，各自形成不同的國際體系；不同的國際體系，各有不同的國際秩序原理，用以規範其國際秩序，詮釋其國際行為。截至近代，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惟自歐美工業革命以降，近代科技日新月異，旋即發展成為帝國主義，殖民全球，西方《國際法》隨著西力，迅速擴及全球。

近代前後，由於西力東漸，強調「義利之辨」的東方王道政治乃開始面臨西方挾其「堅船利炮」之霸道外交的挑戰。清朝在屢戰屢敗的劣勢下，在西方近代《國際法》的主宰下，屢屢簽訂城下之盟，因此規範東方「中華國際體系」之國際秩序原理的〈五倫國際關係論〉，從此消聲匿跡。有鑑於此，如何找回強調「義利之辨」的東方王道政治，並重新建構此一規範東方國際秩序的〈五倫國際關係論〉，成為筆者的長程研究目標。

今天，真正的中國傳統國際關係雖已渺不可知，且國際學界因深受費正清《中華世界秩序》(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sup>2</sup>。一書的影響，而誤以為「朝貢體制」就是中國對外的國際關係，其實《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下的〈五倫國際關係論〉，才是傳統中國的國際關係。

由於以傳統中國為中心的〈五倫國際關係論〉，曾規範東方國際秩序達二千年以上。其國際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中華國際法』的主體所建構的國際秩序，與西方近代《國際法》主體所建構之主權對等的國際關係，截然不同。『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因透過「五倫」的「倫理典範」規範其國際關係，所以形成「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夫婦之邦、兄弟之邦、朋友之邦」的「天下」與「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天下+國家」之國際關係的特徵就是階層的國際秩序，規範其國際秩序的原理就是〈五倫國際關係論〉。在〈五倫國際關係論〉之中，規範「君臣之邦」的倫理就是「君臣倫」、規範「父子之邦」的倫理就是「父子倫」、規範「夫婦之邦」的倫理就是「夫婦倫」、規範「兄弟之邦」的倫理就是「兄弟倫」、規範「朋友之邦」的倫理就是「朋友倫」，其共同的公約數就是「倫理」，因其規範天下或國家的「倫理」計有五種，故合而稱之為〈五倫國際關係論〉。

五倫之中，透過國家「統治者」=「王室」之相互間的和親關係，所建構的國際關係，就是「夫婦倫」國際關係。所以，「夫婦倫」國際關係，就是基於婚姻所形成的國家間倫理秩序。如何建構「夫婦倫」國際關係之倫理秩序的理論論述與歷史事例的驗證，就是本文的問題意識。因此，本文擬進一步建構「夫婦倫」國際關係的理論論述，同時以漢唐與周邊民族或國家間的和親史為例，進一步驗證「夫婦倫」的倫理典範對維持天下秩序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

2 費正清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總之，本文採傳統中國之〈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夫婦倫」來觀察隋王朝對周邊國家的邦交關係，並以「夫婦倫」的「倫理」、「典範」來考察當時中外透過和親所建立之邦交關係的穩定性，用以詮釋傳統中國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中的〈五倫國際關係論〉，並藉以闡揚〈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倫理」「典範」精神及其秩序原則，力圖重新詮釋傳統中國之國際關係，進謀透過該「倫理」之典範，所建立之國際規則與國際法理，開創東方型傳統國際關係。

## 二、〈五倫國際關係論〉的理論論述

《尚書》〈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就是期待代替「天帝」統治「天下」的「天子」(周王)，必須視民如「赤子」，養之育之。相對的，「赤子」亦須視「天子」如「父母」，愛之戴之。在「天命論」的基礎下，天子成為父母，天下成為家族，開始形成「天下一家」的觀念，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中華世界，將家族性的倫理關係擴展到國際性的邦交關係。

《論語》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分秩序，《孟子》稱：「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sup>4</sup>的五倫精神，其實就是根據周朝以宗法組織和封建組織所融合、建立的政治體系，並加以闡揚的倫理精神<sup>5</sup>。換句話說，傳統中國之國際視域下的天下秩序，其實就是在〈五倫國際關係論〉下體現天下的名分與秩序。

在封建制度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王=天子，冊封同宗子弟、異姓功臣等為諸侯，盡皆用以藩屏王朝。為「天下」長治久安之計，王朝又構建宗法制度，對同姓諸侯以嫡長子(王室稱太子，諸侯稱世子)為大宗來繼承爵位，「天子」遂成「天下」大宗的總宗主，小宗用以護持大宗，諸大宗則用以藩屏總宗主，故總宗主，既是君又是族長。對異姓功臣則以聯姻為手段，來加以籠絡。使同姓諸侯皆為「兄弟、伯叔」的血親連繫，異姓諸侯皆為「舅甥」的姻親連繫，於是成為所謂之「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天下共同體。又，當「中華思想」與「華夷思想」一相結合，以中華為主體結合四夷之「中華世界」的主屬思想和宗藩關係，就隨之擴大不已。降及後世，中國與四夷=華夷的民族接觸日益頻繁，加以中國國勢時強時弱，強者外征，弱者偏安。至於屬藩對屬藩間的關係則介於「兄 vs. 弟」的序列先後或「朋 vs. 友」的對等關係。惟考諸中國與四夷之邦交關係，在「天下一家」的觀念下，遂將規範「一家」的「倫理」，擴大為規範「天下」的「倫理」。要之，兩者都以「五倫」做為規範體系成員的倫理。因此，隨著國勢的強弱不同，天下邦國的「國際」秩序，亦隨之變動不已，「五倫國際關係」的稱謂與「事大交鄰」的外交禮儀，也隨之產生變化。尤其是，在天下中心崩解、周邊紛紛崛起的時代，如春秋戰國或唐宋五代，更是內涵豐富，景像千變萬化。

在正常的狀況下，中國與周邊民族皆建立「君臣」關係，因「事君猶事父」<sup>6</sup>，故「君臣倫」關係同時也是「父子倫」關係，於是建構出「君父 vs. 臣子」等上下、尊卑的縱軸(正階層)關係。惟一衰則改建為「兄弟」、「叔侄」、「叔祖侄孫」等序列先後的「兄弟倫」關係，再衰則只能

3 《論語》，〈顏淵〉。《論語》，〈八佾〉，亦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本文以下如有關於《論語》、《孟子》等「十三經」的引用，均出自《十三經注疏》(新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合先敘明。

4 《孟子》，〈滕文公〉上。

5 張啟雄，〈論清朝中國重建琉球王國的興滅繼絕觀〉，《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那霸：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1989)，頁 512-513。

6 《春秋公羊傳》，〈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

建立「朋友倫」關係等橫軸（對等）關係；既衰且弱，則只好建立「舅甥」等具安撫性或屈辱性的「夫婦倫」等斜軸（半階層）關係；更有甚者，甚至為勢所迫，而建立屈辱性「兒皇帝」之關係逆轉的階層性倫理；或等而下之，在政治倫理上淪為關係至為屈辱、地位完全逆轉的「君臣倫」、「父子倫」等縱軸（負階層）關係。後三者，若非斜軸，則是縱軸的華夷逆轉性階層關係（參見圖一，頁244）。此時，乃中華淪為夷狄，夷狄進於中華，甚至入主中國＝「中華世界帝國」，換句話說，雖然天下大亂，但是在《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爭天下論〉的規範之下，「中華世界帝國」會爆發「朝代更迭」，無論是「華華革命」或是「華夷變態」的「王朝交替」，天下還是會回歸大一統，獲得天命的革命者，無論華夷，都將成為正統王朝。

最後，無論是華華間或華夷間的朝代變革，它在〈大一統論〉的號召下，華夷透過文化融合，民族通過血緣熔煉，形成了一體多元性民族熔合與華夷文化融和的新興中華，新生中國，因誕生新正統王朝，天下又回歸大一統，王朝創建新正統，宗藩關係也回歸「君父 vs. 臣子」的名分秩序，而開拓出新的時代和平，建構出大一統的新國際秩序。此等〈五倫國際關係論〉的邦交關係，史上皆不乏其例，尤其在朝代更迭之時，天下分崩離析之際。考諸歷代宗藩關係，誠如闡述春秋時代之邦交關係的《春秋公羊傳》所言：「事君猶事父也」，故屬藩於朝貢中國時，所以經常提及「以小事大，如子事父」、「義為君臣，情為父子」，其根據即在於此。

### （一）〈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倫理概念架構

《禮記·昏義》稱：「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由此可知，夫婦關係乃五倫關係之始。其中，夫婦、父子、兄弟等三倫，源於夫婦婚配而成一家，於是有父子血緣，兄弟血親等親情，是為天倫。因此，天倫的親情，遂經常為亂世豪傑所借用，成為安定天下或爭天下的利器，「五倫」乃與「國際關係」結上不解之緣，而形成「五倫國際關係論」。

根據《孟子·滕文公上》所稱，五倫乃：「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親、義、別、序、信」為其原則，乃所以形成家族倫理的關鍵概念，其規範對象，原由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等人際關係，推而廣之，而及於天下之國際秩序，成為構成「君臣之邦有義」，「父子之邦有親」，「夫婦之邦有別」，「兄弟之邦有序」，「朋友之邦有信」等國際關係之倫理性概念結構。更可貴的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五倫關係並非單向的倫理規範，而是雙邊負有權利義務的對等關係。孟子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荀子則更進一步詮釋，表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由此可知，「道」高於君，「義」優於父，因此規範邦際關係的「倫理」＝歷史文化價值就成為安定天下所追求的「道」。

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家國天下乃人之組合，動物園（野生）則是禽獸的聚合處。前者有倫理規範，後者為生存競爭。是故，「人獸之辨」在於「倫理」。因家國皆人之組合，故將家族之「人倫」推而及於國家、天下。因倫理之規範行否，而有「君子之國」與「禽獸之邦」之別。據此，「五倫」遂同時成為規範「人、家、國、天下」的倫理。因此，〈五倫國際關係論〉遂成為規範「中華世界帝國」之邦際關係的「倫理」。其理想，則在於建立承平之

7 惟強大如大唐，亦曾實施安撫性質之「夫婦倫」的「舅甥之邦」。

時與亂世之際的倫理規範，同時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利器。茲就其倫理之概念與典範，扼要詮釋如次：

### (1) 君臣之邦

基於「君臣有義」，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君君」然後「臣臣」，各有權力義務，恪守名分，遵行秩序，故「君禮臣忠」，為其典範。封貢體制下的宗藩關係都是「君臣之邦」，漢唐宋元明清等盛世，皆屬之。其中，尤以因備受華夷愛戴，而普獲「天可汗」尊崇的唐太宗，為其典型史例，是為「君臣倫」；

### (2) 父子之邦

基於「父子有親」，故「父慈子孝」為「父子倫」典範，在漢唐宋元明清等盛世，特別是清雍正帝憐惜屬藩的慈愛，為其典型史例；反其道而行的，則有契丹與後晉間，石敬瑭自稱兒皇帝，石重貴但稱孫不稱臣，終遭契丹所滅，雖是「父子倫」，但孫不孝祖不慈，完全背離「父子倫」之皇室家族間的政治倫理，是為反其道而行的「父子倫」；

### (3) 夫婦之邦

基於「男有分，女有歸」的觀念，故以男為主體，以女為歸依，而形成「夫婦有別」的社會現象。又，夫婦因職分內外，各守本分，相親相愛，夫唱婦隨，夫主而婦從；因愛屋及鳥，而兼及家人，故姻親相安，相敬如賓，此為「夫婦倫」典範。

因和親而形成「夫婦之邦」的「天下關係」，乃是傳統中國王朝與內陸的國家或民族間，將「家族關係」擴張成「國際關係」，將「家族倫理」延伸為「國際倫理」，最後形成規範中國勢力所及之處而成為「天下秩序原理」。「夫婦之邦」傳及後世，因宗族繁衍，而有輩分高低之差，年齒長幼之別，論其內涵，計有翁婿關係、表兄弟關係、舅甥關係、外公外孫關係等四種類型。

就歷代中國之天下秩序而言，因中華文化遠遠超越四鄰，造成華「尊」而夷「卑」的文化現象，故漢為「主」國，胡為「從」國，具「主 vs. 從」的階層關係。「和親」，乃透過「皇室」家族間的結合，換取「王朝」國家間之安泰，進而謀「天下」太平，故〈夫婦倫〉始於「齊家」，而逐漸擴及雙方家國（皇室與王朝）的「治國」，終於「天下一家」的「平天下」。

一般而言，「夫婦之邦」於成立之前，始於漢胡不論敵友，常先結為異姓「兄弟之邦」，然後透過「和親」，將「中華公主」降嫁「戎狄可汗」，以便構成以「公主」為中心之「家族倫理」擴大為規範戎狄之「王室家族」的「倫理」，以構成規範「雙方王室」之家族間的名分秩序關係。然後，形成「翁→婿、表兄→表弟、舅→甥、外公→外孫」等上下尊卑主從的「家族」網絡關係，最後則透過「封貢體制論」，將家族關係轉型成為國際關係之故，在國際關係上扮演「夫婦之邦」之「主體」的皇帝（天可汗）「冊封」扮演「從體」的可汗，而可汗則行「朝覲貢獻」之禮，雙方從此走向「君 vs. 臣」、「天下 vs. 國家」的關係。這就是因「和親」而建構王室家族間「政治通婚」網絡之《五倫國際關係論》中〈夫婦倫〉的姻親國際關係。

至其倫理，無論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以孝悌禮敬忠信為私德之典範，以友好互助為公德之典範。翁婿、表兄弟、舅甥、外公外孫等上下尊卑關係正是倫理典範「孝悌」所規範的家族領域，而友好互助則是夫婦之邦共謀邦國共存共榮的政治領域。又，因夫婦之邦，乃透過公主與可汗的和親而形成家族性國際政治關係，故在倫理上，既適用家族倫理，也適用於政治倫理，因而在「外交倫理」上，皆以「翁」、「表兄」、「舅」、「外公」為「主」，而以「婿」、

「表弟」、「甥」、「外孫」為「從」，此即翁婿關係、表兄弟關係、舅甥關係、外公外孫關係等家族倫理，逐漸演變成爲「主從關係」的政治倫理，最後則進一步走向〈五倫國際關係論〉的極致，而形成「君 vs. 臣 + 父 vs. 子」=「君父 vs. 臣子」之邦，臣子入朝，朝貢君父，並接受君父冊封，直到「天下一家」的國際秩序網絡一一建構完成。歸納言之，「封貢體制」是規範「君臣之邦」的制度，而「封貢體制論」則是規範「君臣之邦」的歷史文化價值，也是『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重要次級原理。

據此典範「和親」遂從「夫婦之邦」轉型成爲「君父 vs. 臣子」之邦，爲「中華世界帝國」=「天下」的邦際關係帶來超穩定的國際結構。其道理在於，君臣關係具有「因名定分，因分定序，循序運作，則秩序井然」的功效，在「相敬如賓」、「愛屋及烏」、「信守承諾」以及「君禮臣忠」等典範之下，基本上，君不侵略臣，父不侵略子，夫不侵略婦，兄不侵略弟，則國泰而民安，天下泰而平。相對的，朋友之邦，雖有「信」爲倫理典範，但在「何以利吾國乎」的前提下「交征利」因「交征利」而利害衝突，再因利害衝突而反目，又因反目而爆發強凌弱，眾暴寡的敵對現象。此時，朋友之邦淪爲敵國；「有信」的「朋友倫」典範，常爲見利忘義的「朋友」所踐踏。是故，朋友之邦 = 友邦成爲最不穩定的國際關係類型。

反之，夫婦之間，也可能因勃谿而反目，因利害衝突而離異。同樣的，國際政治下的夫婦之邦，一旦背離「倫理」的規範，輕者可能因文化價值衝突而疏離，重者或因利害衝突而爆發戰爭。

有唐一代，共有二十位公主與十個不同民族和親。其中，唐太宗曾以宗女弘化公主嫁吐谷渾王，文成公主嫁吐蕃贊普，唐肅宗以後，唐天子也曾三次以親生公主甯國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先後降嫁迴紇（回鶻）可汗和親。漢唐時代的漢胡華夷關係，即因中外和親而締結「舅甥之盟」，留下「舅甥碑」，爲其史例。因為歷史文化價值的典範，而規範著現實的國際政治，成爲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紐帶，而爲天下帶來共存共榮的太平，是爲「夫婦倫」下的「夫婦之邦」：

#### (4) 兄弟之邦

基於「長幼有序」，故兄友弟恭，先後有序，爲其典範。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鬩牆兄弟，何以團結一氣，外禦其侮？蓋親疏有別，血濃於水之故使然。是故，人有桃園結義，江湖有梁山歃血，國有兄弟之邦，雖異姓兄弟，亦親如一家，有甚於兄弟者。因此，宋遼締盟於澶淵，結爲兄弟之邦，創造 122 年太平盛世，爲其典型史例，是爲「兄弟倫」：

#### (5) 朋友之邦

基於「朋友有信」，「信守承諾」，爲其典範。然益者三友，損者亦三友。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sup>8</sup>。推而廣之，結交具有正義感、誠信、知識廣博等益友之邦，則可以提高國家品德，但結交具有邪門左道、諂媚奉迎與巧言令色等損友之邦，則於國家有害。

戰國時代，梁惠王對孟子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8 劉美崧，〈唐代真公主與回紇的和親〉，《江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1981，頁 42。

9 《論語》，〈季氏〉，第十六。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sup>10</sup>。相對的，美國歷任總統或西方政界領袖，皆曰：「這符合美國的利益」或「符合我國的利益」。鑑於「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故「義利之辨」，為其典範，也是東西方最大的差別所在。所以，「義利之辨」，乃中國之特有歷史文化價值，而「倫理」則是東西方最大的差別所在。

概括而論，益友守信，損友謀利，遇有利害衝突，棄友背信，唯利是圖，甚至進而訴諸武力，乃國際關係不穩定之根源。戰國七雄晝夜征戰，遭後世批判，為其典型史例，是為「朋友倫」之「損友」象徵。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雖美其名為「友邦」、「主權對等」，卻經常受船堅炮利之苦，屢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國破家亡，幾乎淪為歐美國家之殖民地。至於其他亞非拉美等國家，雖亦號稱西方式「朋友倫」下「主權對等」的「友邦」，惟亦幾乎盡皆慘遭歐美「近代國家」夷為「殖民地」，以致連做為「國家」的地位、資格以及機會都被歐美國家剝奪殆盡，此事當然更屬反其道而行之歷史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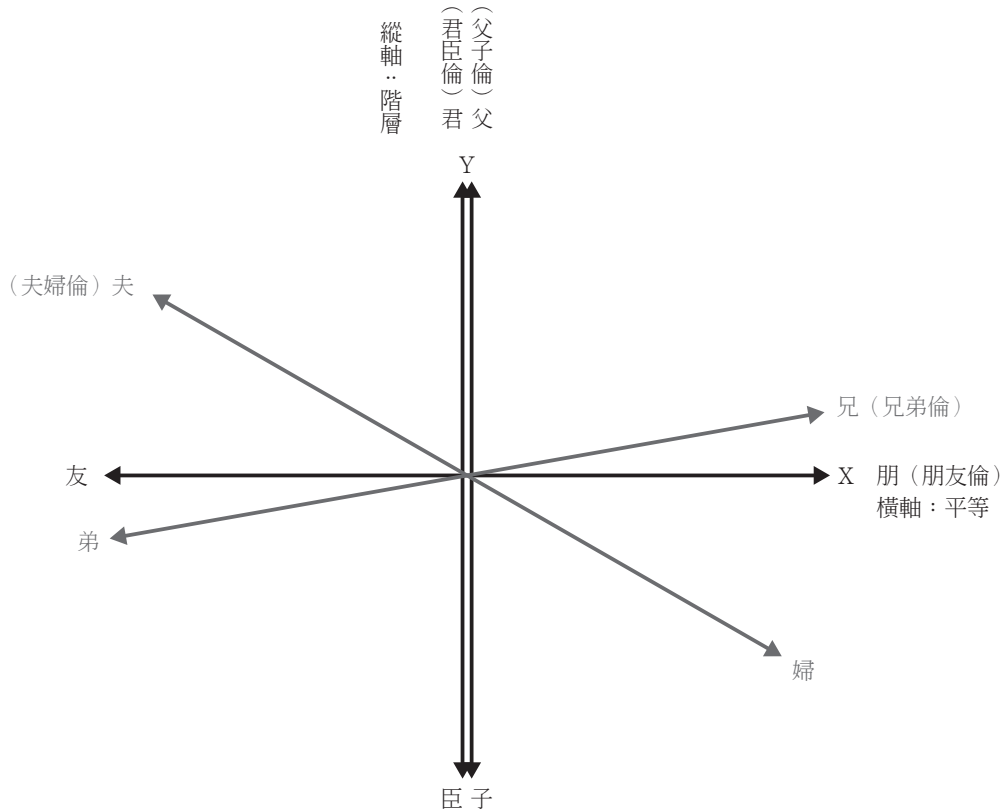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五倫，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理，是所以明上下、主從、尊卑、長幼、內外、敬愛、親疏、遠近、誠信之禮儀也。原本為規範「一家」的齊家之學，用諸國際關係，始轉為規範「天下」的治國、平天下之學，於是有〈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君臣之邦、父子之邦、夫婦之邦、兄弟之邦、朋友之邦。在「中華世界帝國」之中，違反〈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倫理」者，將受到懲罰；恪守「倫理」者，將受到保護。因為〈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倫理」具有規範力，因之，「中華世界帝國」得以長治久安，其國際秩序也得以長久維續。

由上可知，五倫國際關係在文化價值上有其典範，在歷史上也多有其典型善例傳世，惟亦偶有反其道而行的典型惡例警世。惟當〈五倫國際關係論〉慘遭惡用之時，狼煙四起，國破家亡，家園殘破，社會動盪，人心不安，互信蕩然，萬里為之一空；反之，善用〈五倫國際關係論〉之際，則國際上化暴戾為祥和，社會上安和好禮，因而為「中華世界帝國」開太平盛世，亦耳熟能詳，不外存乎一心，善用倫理而已。文化價值發揚典範與否，國際社會走向典範與否，全視其是否心存善念，益心有善例，損心有惡例，全視其國際秩序原理是否具有「義利之辨」之文化價值的「倫理」規範而已。因此，若唯利是圖則國際關係詭譎多變，恃強凌弱，以眾暴寡，明知以鄰為壑卻仍恬不知恥；反之，講求「義利之辨」則國際社會好禮行義，富於倫理規範，秩序井然之盛世可期。何者適於人類生存，有益於國際社會運轉，不言自明。

在「中華世界帝國」的天下中，中華文化積深累厚，因宗藩歷史悠久，再透過漢字傳播，「五倫」的「倫理文化價值」普及東方，向來寓「政治生活」於「家族生活」之中，雖不教而能行，於宗藩間、藩藩間，其歷史文化價值相近，國情大略相同，生活習俗相似，透過中華外交禮儀，二千年來邦國摩擦較諸西方而言，可謂微乎其微。何況，規範「中華世界帝國」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中，因有「事大交鄰」的禮儀規範，其外交一向圓潤，何況有〈以不治治之論〉的國際秩序原理，上國從不干涉屬藩內政，宗藩也絕少摩擦；另有〈興滅繼絕論〉，上國對屬藩負有存國存祀的義務，鋤強扶弱，濟弱扶傾，故周邊諸小國歷經二千餘年，直到西力東漸之際，宗藩仍行禮如儀，家國雖傳諸萬世而未輟，迄今長存。

10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11 關於倫理規範，請參閱：王景海等編，《中華禮儀全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



圖一：〈五倫國際關係論〉基本倫理座標圖

出處：作者依自創之〈五倫國際關係論〉建構「兄弟倫」之兄弟後倫理秩序。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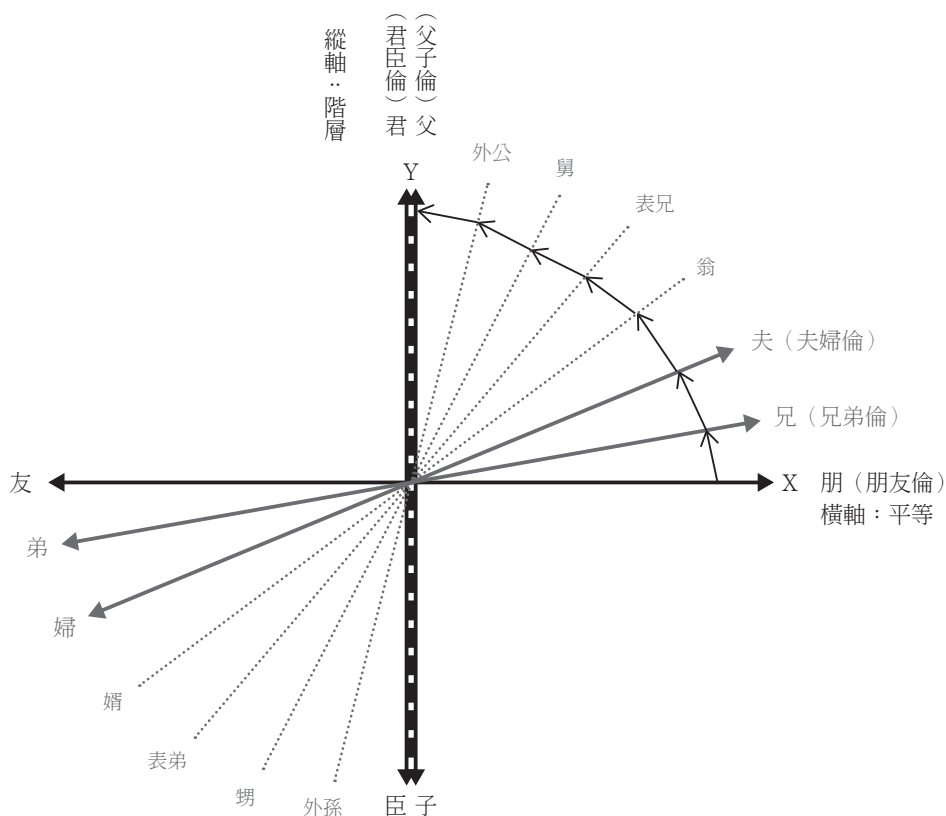
1. 依五倫之倫理建構 (1)君臣倫、(2)父子倫、(3)兄弟倫、(4)夫婦倫、(5)朋友倫。
2. 橫軸(X)代表平等，軸上為尊，軸下為卑，具上下尊卑之意涵。
3. 縱軸(Y)代表階層，軸右為前，軸左為後，前後左右具優先順位之差異。

## (二)〈五倫國際關係論〉的概念圖示

「中華世界帝國」之宗藩秩序體制，乃源於規範家族倫理或規範社會倫理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精神，乃推而廣之轉換成政治倫理的「君臣之國、父子之國、夫婦之國、兄弟之國、朋友之國」，因而形成「五倫邦交體制」。在治世，規範「中華世界帝國」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五倫國際關係論〉中，僅僅使用「君臣之國」、「父子之國」等二倫，（雖間亦雜有「夫婦之國」史例，然多意在安撫），此時〈五倫國際關係論〉的「君父臣子」精神，反而更加有力的規範著「中華世界帝國」的天下秩序。然而，處亂世之際，尤以國力衰頹之時，群雄崛起，五倫國際關係則輪番上陣，為紛擾不安的國際社會扮演安定的角色與作用。總之，〈五倫國際關係論〉之要，乃在於以五倫之「倫理」論述做為規範宗藩間與藩藩間之「國際名分」秩序，而形成東方運作逾二千年之「事大交鄰體制」的五倫國際關係。至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五倫國際關係論〉下之倫理概念與倫理規範的座標圖，請參見：圖一、圖二、圖三。

由於「中華世界帝國」的國際關係體制具有五倫精神，而五倫的邦國倫理關係又來自封建制度與宗法制度的融合運用。邦國的「政統」來自於封建制度，具有受天子冊封的合法性；諸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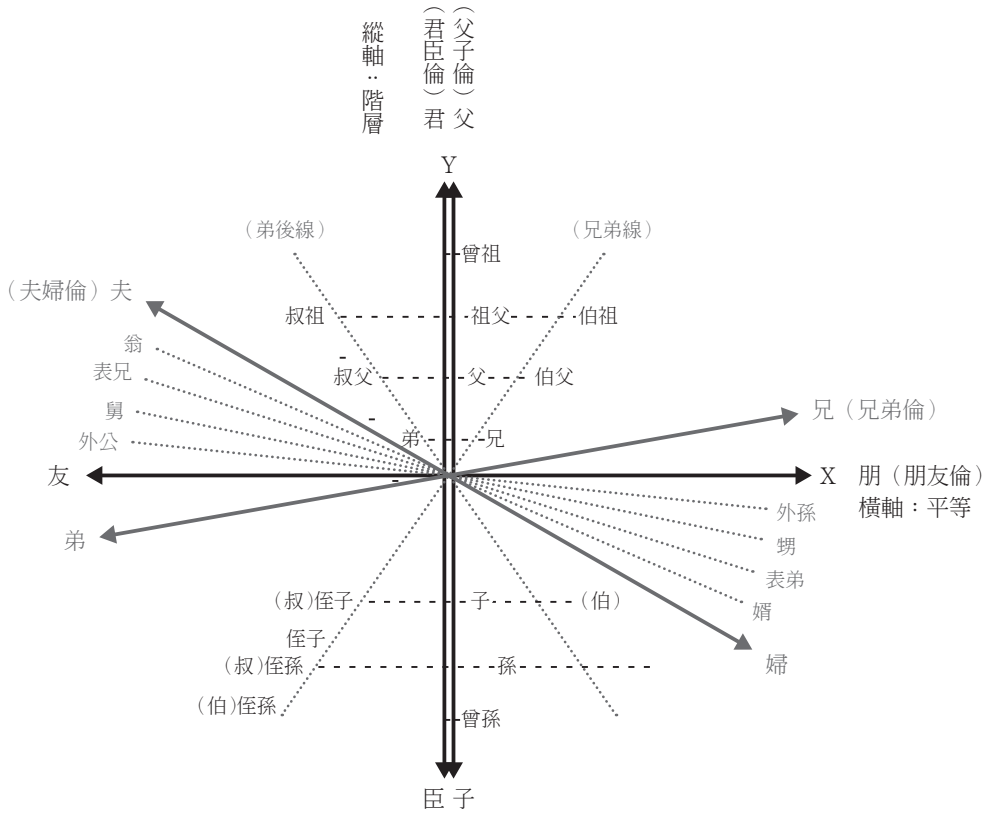
圖二：〈五倫國際關係論〉「夫婦倫」之倫理秩序演變座標圖

出處：作者依自創之〈五倫國際關係論〉建構「夫婦倫」+「兄弟倫」之倫理秩序演變。

說明：

1. 依五倫之倫理建構 (1)君臣倫、(2)父子倫、(3)兄弟倫、(4)夫婦倫、(5)朋友倫。
2. 橫軸(X)代表平等，軸上為尊，軸下為卑，具上下尊卑之意涵。
3. 縱軸(Y)代表階層，軸右為前，軸左為後，前後左右具優先順位之差異。
4. 透過X軸交叉Y軸，通過對角線，先自X軸的「朋友倫」經「夫婦倫」走向Y軸，再由X軸回歸Y軸，用以區分翁婿、表兄弟、舅甥、外公孫等姻親倫理關係，因華夷結合成為一家，於是「中華國際體系」與「戎狄國際體系」一旦相互結合，就形成「天下一家」。
5. 為了規範「一家」需要「父子倫」，為了規範「天下」需要「君臣倫」，最終則形成「君父臣子軸」，將「家族倫理」轉化成為「君臣倫理」，將「家族關係」轉化成為「君臣關係」。
6. 於是運用「君對臣」的「冊封」與「臣對君」的「朝貢」=「封貢體制論」來規範「和親」下的「華夷君臣關係」。這就是「華夷和親」下〈夫婦之邦〉國際倫理關係的演變過程。其中，「封貢體制論」正是扮演將「家族關係」轉化成為「君臣關係」的關鍵角色。
7. 縱軸(Y)的君臣之間、父子之間，有黑底白點的虛線，稱之為封貢體制線，代表因和親而形成宗藩君臣關係。

「王統」源自於宗法制度，具有血親連繫與姻親連繫的倫理連帶關係。平時，諸侯的功用在於藩屏王室；有事，則邦國存續與宗廟存續，均因受王（皇）室保護而傳之不絕。「義為君臣，情為父子」的五倫精神，正是維繫「中華世界帝國」之宗藩秩序體制的精髓，既洋溢著封建性的政治連帶關係，也充滿著宗族性的倫理連帶關係。承平之時，天子作為「君、父」的權利，諸侯作為「臣、子」的義務，即「忠君愛國」的觀念，經常受到強調。非常之際，天子作為「君、父」的義務，諸侯作為「臣、子」的權利，即「興滅繼絕」的觀念，反而受到強調。因此，在中華世界的宗藩關係上，諸如：「以小事大，如子事父」、「臣之事君，遵君之敕可也，……子之事父，奉父之



圖三：〈五倫國際關係論〉「兄弟倫」+「夫婦倫」倫理座標圖

出處：作者依自創之〈五倫國際關係論〉建構「夫婦倫」+「兄弟倫」之倫理秩序演變。

說明：

1. 依五倫之倫理建構 (1)君臣倫、(2)父子倫、(3)兄弟倫、(4)夫婦倫、(5)朋友倫。
2. 橫軸(X)代表平等，軸上為尊，軸下為卑，具上下尊卑之意涵。
3. 縱軸(Y)代表階層，軸右為前，軸左為後，前後左右具優先順位之差異。
4. X軸上下與Y軸左右，各有虛線交叉之兄前線與弟後線，再依Y軸區分祖、父、我、子、孫等五階層構成平行虛線，雖含有前後對等之意，但在倫理秩序上卻有孰先孰後之優先順位。
5. 透過X軸交叉Y軸，通過對角線，來表現「夫婦倫」的翁婿、表兄弟、舅甥、外公孫等因「華夷和親」而形成姻親倫理關係的演變。

命可也」等表文、詔敕，經常可見<sup>12</sup>。此乃《論語》所以稱：「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的道理，就在於此。<sup>13</sup>

因之，太平時期的「冊封朝貢」關係，非常時期的「興滅繼絕」義務，於焉發生。天子要護持天下的倫理秩序，對於諸侯或屬藩的邦國存亡，在封建制度上基於宗藩的政治倫理，「存國主義」產生作用；在宗法制度上基於宗藩的家族倫理，「存祀主義」也爆發力量。此即，《禮記》所稱：「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之義<sup>14</sup>。於是乎，「興滅繼絕」的思想論述，因之應運而生；

12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癸丑條。

13 《論語》，〈堯曰〉。

14 《禮記》，〈中庸〉。

「興滅國、繼絕祀」的義務踐履，也就伴隨興師救援的行動而付諸實現<sup>15</sup>。

### (三)〈夫婦倫〉在華夷國際秩序上的倫理規範

「義利之辨」為儒家形塑中國傳統邦交關係的最高文化價值，認為「中華以禮義，四夷以利益」做為其立國的文化價值，雖各自形成邦國，生息於天下，但有「華夷之別」。因此，《冊府元龜》根據歷史經驗，對中外「和親」開宗明義表示：

戎狄之國，世為邊患，禮義不能革其貪，干戈不能絕其類。故上自虞夏、商周，固不程督。雖有窮兵追擊，而亦亡失略等，所謂獸聚鳥散，從之如搏景者也，是以聖人用權變之道，遠御不絕而已。<sup>16</sup>

易言之，對於蠻夷戎狄，中華雖以禮義不能革其心，用武力不可變其行，何況飄忽不定，纏鬥猶如搏影，故歷代聖人只能從其性，權變遠馭而已。所以「和親」就成為「聖人用權變之道，遠御不絕」的手段，希冀先以「家族倫理」加以規範，納入「天下一家」，直到華夷融合為一體，天下形成之際，再以《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加以規範。總而言之，和親乃是中國為了與文化價值迥然相異的戎狄和平共存起見，所行的「權變」之道，也是民族自治的「以不治治之論」。

## 三，隋文帝建構的聖人可汗型夫婦之邦

六世紀初，突厥族原興起於阿爾泰山一帶，後逐漸南下建立汗國。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沙鉢略大可汗統領突厥諸部與立足於南方的新建王朝隋朝對抗。沙鉢略命阿波可汗率騎南下，但為隋軍所敗，旋引發突厥內鬥紛爭。其後，阿波可汗率眾投奔西部的達頭可汗，以對抗沙鉢略可汗。因雙方不斷相互攻擊，終於分裂成為東西兩汗國。東突厥沙鉢略可汗位於隋朝北境，西突厥達頭可汗則位在隋朝西北方。

隋文帝掌握東西突厥的對抗契機，企圖利用和親政策，聯合東突厥沙鉢略可汗以對抗西突厥。事實上，東突厥沙鉢略可汗為了對抗西突厥，更是亟圖利用和親，以聯合隋朝對抗西突厥，進謀稱霸突厥，遂在國際政治上暴露可乘之機。此時的隋厥關係，屬於對等的「敵國」＝「敵體」關係。對中國與中亞匈奴突厥等胡人民族而言，「和親」就是結盟互助的情誼象徵，進可轉為聯手抗敵的盟友，退可化為和平共存，免於後顧之憂的邦交關係。於是「和親」就成為隋朝－突厥間的結盟工具，扮演媒介國際政治之力量分合的重要角色。根據《冊府元龜》的隋厥和親記載：

隋文帝開皇中，突厥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蘆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約。此國所有羊馬，都是

15 張啓雄撰、伊東貴之譯〈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値〉，《中国—社会と文化》號 24，2009年7月，頁76-80。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の起源—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の古典文化価値〉，吳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14-116。

16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八，〈外臣部〉（二十三），「和親」，（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11317。

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sup>17</sup>。從「辰年」的干支紀元，可知突厥沙鉢略可汗，透過「和親」，不但建立「夫婦之邦」的「翁婿關係」，而且奉隋朝紀元為「正朔」。因此，《隋書》在開皇六年（586年）春正月條記載：「庚午，班（頒）曆於突厥」，令其「奉正朔」<sup>18</sup>。農業民族的曆法頒布至草原之遊牧民族，象徵著透過「和親」的「夫婦之邦」，中華文化的向外傳播與政治的主從關係也已開始建立，有助於建構天下一統的文化形象與文化融合。

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公，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已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sup>19</sup>。

實際上，當時沙鉢略可汗並未與隋文帝建立「血緣」的和親關係。若究其和親，乃沙鉢略可汗曾在楊堅的支持下，因尚千金公主而與北周建立和親關係。不久，隋代北周而有天下，隋文帝仍以千金公主為公主，以沙鉢略可汗為女婿，繼承北周與東突厥的和親成果。因此沙鉢略可汗仍以和親尚千金公主為名，假藉「皇帝=婦父」，「可汗=兒例」之「君父 vs. 臣子」的名分秩序，致書隋文帝，強調「羊馬 vs. 繒綵」等物資互通有無，並且不分彼此=「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vs.「彼有繒綵，都是此物」，甚至強調「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以培養中厥雙方之互賴互信，透過「重疊親舊」，以傳諸「子子孫孫，終不違約」，形成具東方特色的階層性「天下共同體」。

隋文帝也以「和親」為基礎，強調大隋天子既是沙鉢略可汗之「婦公」=「妻父」，也視可汗如子。基於家族倫理，在「常使」之外，還特別派遣「專使」代表家族探望「女兒」，並因愛屋及烏而探望女婿=沙鉢略可汗。隋朝與突厥雙方，因遵循〈夫婦倫〉的「倫理」與「典範」，而形成「夫婦之邦」的典型範例。顯然，隋文帝深刻了解周遭異族之思維與生活方式，故能應對自如而遊刃有餘，乃寵之以「和親」之親，以便將突厥納入隋朝所安排〈五倫國際關係論〉之下，〈夫婦倫〉秩序體制之中，形成以隋朝為天下中心的階層國際秩序體制。

由於「翁婿之邦」的感情彌篤，故突厥沙鉢略可汗對隋文帝楊堅執禮甚恭。在國際政治上，雖以「可汗 vs. 皇帝」之對等頭銜相稱，但是在「皇室」的家族倫理上，則以「夫婦之邦」的〈夫婦倫〉為本，以子婿自居，而尊稱婦父為翁，形成「翁婿關係」=「女婿 vs. 岳父」，且希望子子孫孫，親上加親，直到永遠。在國際經濟上，突厥對雙方物資表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故強調羊馬繒綵，互通有無，在翁婿分治的天下，出現類似「財經共享、互通有無」的烏托邦理想。隋文帝雖以「大隋天子」對「大突厥沙鉢略可汗」的對等稱號稱呼突厥可汗，但以「婦公」=妻父自稱，視「沙鉢略可汗」為「兒子」，二國關係如一家之親，而時遣特使「看女，復看子婿」，讓雙方綿綿情意，化天下為一家。透過「和親」，將他國納入己國的家族倫理秩序之下，形成「夫婦之邦」的天下型國際關係，進而應用〈夫婦倫〉之「倫理」規範天下，以形成良性循環之古典國際關係，此實為今日西方國際關係所不及之處，譽之為國際關係之「典範」，亦非過言。故「天下一家」的國際關係，就是建立在具有「倫理」與「典範」的觀念下，所形成的一種較為人所熟知，且容易遵循的國際規則，而轉化成為良性循環的國際關係，而「倫理」就成為今日國際關係首須借鑑參酌的典範。

17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 11323。

18 《隋書》卷一，帝紀第一〈高祖上〉，開皇六年正月條，（台北：鼎文書局，1980），頁 23。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 I》（東京：山川出版社，1967），頁 441。

19 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 11323。

開皇七年（587年），沙鉢略可汗死。遺言立其弟處羅侯為「葉護可汗，以其子雍〔虞〕間為葉護<sup>20</sup>」，處羅遂繼位為葉護可汗（又稱處羅可汗）。《隋書》云：「攝圖（沙鉢略）死，（隋文帝）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虞〕間為葉護可汗<sup>21</sup>。由此可見，不論莫何可汗，或是葉護可汗，都建立在〈封貢體制論〉的基礎之上，從此隋之威令，行於突厥<sup>22</sup>。其後，處羅可汗死，其眾奉沙鉢略子雍虞間繼位為汗，稱葉護可汗（又稱都藍可汗）。都藍可汗依突厥習俗，娶後母千金公主為可敦。就此而言，隋厥關係不但建立在「和親」的「夫婦倫」上，而且在「封貢體制論」下，進一步受到〈五倫國際關係論〉之「君臣倫」的影響，既成為「夫婦之邦」，也成為「君臣之邦」。可見，在王室和親上，透過家族倫理擴大成為國際倫理之時，「夫婦之邦」最後也會走向「君臣之邦」。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1年），吐谷渾主伏使其兒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帝）後庭」。帝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隋文帝不許的理由，其中當含有有政治性考量。深入分析的話，在「政治和親」中，若隋文帝納吐谷渾公主以備後庭的話，在「夫婦之邦」的「翁婿關係」上，就「夫婦倫」的「倫理」而言，在華夷姻親的家族關係上，隋文帝將屈居為吐谷渾可汗的女兒之「婿」，不得不向后妃之父的「翁」=岳父行晚輩之大禮，即使皇帝與國內后妃之父=岳父之相見禮，早有宮廷禮儀規範，但國際間之和親既有家族與家族之關係，更重大的則是國家與國家，甚至涉及上國與下國間的倫理與利害關係，就此而言，或不利於「聖人可汗」之「國際共主」地位的建立。

十六年（596年），以先化公主妻吐谷渾主伏，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帝不許。其年，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為（國）主，使請依俗尚（娶）公主，帝從之。自是朝貢歲至<sup>24</sup>。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注意的事，乃是和親大都是中國以公主降嫁戎狄可汗，未聞中國皇帝與西域北荒公主和親之事。另，吐谷渾自隋文帝降嫁公主後，從此遣使「奉表稱藩」、「朝貢歲至」，因而建立了冊封朝貢關係，而受「封貢體制論」的規範。

換句話說，透過「和親」，將「家族倫理」擴大為「國際倫理」，令「翁婿之邦」，「奉表稱藩」以收「朝貢歲至」忠誠，然後以〈夫婦倫〉之「倫理典範」，廣結天下各路「王室家族」，讓「華夷世界」轉化成為「中華世界」，形成「天下一家」，以領導「天下秩序」，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至於「片面」和親，本是漢胡常態，惟在中華文化領域內，本無「和親」習俗。意外地，吐谷渾主竟奏請「以女備後庭」，以事文帝，惟為文帝所拒，蓋歷史文化價值不同所致。

一般而言，華夷和親，從來單向之故，文帝乃認為吐谷渾主伏必有所求，而非出於至誠，而婉辭謝絕。但為華夷和親通好，仍以「先化公主」妻吐谷渾主伏。吐谷渾主為投桃報李，擬以「天后」之名分冊封公主，雖意在討好，但就文帝而言，無異「僭越」五倫名分，乃加以拒絕。其後，

20 《隋書》，卷八四，列傳四十九〈突厥傳〉，頁1870-1871。

21 《隋書》，卷五十，列傳十六〈長孫晟傳〉，頁1332。根據護雅夫的考證，若沙鉢略既以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又「以其子雍〔虞〕間為葉護可汗」，則勢必造成「一國二君」之錯誤，故認為此乃記載之錯誤，故後者之「可汗」二字應為衍字。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 I》，頁218-219，註10。

22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七六，〈陳紀十〉，（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頁5488-5490。

23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11323-11324。

24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11323-11324。

吐谷渾主果為其國人所殺，更立其弟伏允為主，伏允請依胡俗尚公主，文帝也採「以不治治之論」的觀點，行「因俗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政策<sup>25</sup>，承認吐谷渾人「更立其弟伏允為主」，也令先化公主入境問俗以事伏允。從此，吐谷渾每年入京朝貢。反觀文帝，因懼各國一一獻女以求和親，遂以皇帝至尊，「豈可聚斂子女」為由，拒之。雖也有部份道理在，但喪失表率天下，鼓勵臣民效法，進而透過民間普遍通婚，讓中亞各族與漢族早日捨棄種族觀念，共同邁向「天下一家」之途。

又，東突厥沙鉢略子都蘭（雍虞閭）可汗曾尚隋朝之前朝北周千金公主，隋文帝篡周後，改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並賜姓楊氏。然公主常以北周宗社為隋所篡，心懷不平，為隋文帝所忌。會（公）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蘭不從，乃遣使將美妓以啗之。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帝恐其為變，將圖之<sup>26</sup>。開皇十七年（597年），突厥沙鉢略弟莫何可汗（處羅）之子曰染干（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之。沙鉢略子都蘭（雍虞閭）可汗，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至是，文帝以宗女安義公主妻之。帝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染干）本居北方，以尚（公）主之故，南徙度斤（杭愛山）舊鎮<sup>27</sup>。

此時，突厥之情勢正處於都蘭大汗率玷厥（達頭）、染干（突利）兩小汗，形成三足鼎立之局。根據《冊府元龜》所載：初，突厥雍（虞）閭（沙鉢略可汗之子，即都藍可汗）上表請婚，僉議將許之。長孫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西突厥達頭可汗）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莫何可汗）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取，使敵雍閭，以為邊捍<sup>28</sup>」。帝曰：「善！」乃遣慰諭染干，許尚公主。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迎）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都蘭大汗激憤宣稱，「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絕朝貢，數犯邊<sup>29</sup>。晟說染干率眾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sup>30</sup>。從此，都蘭大汗脫離隋厥宗藩關係，突利可汗染干則取代都蘭大汗的聘交地位，與隋文帝建立「翁婿關係」，為隋朝扞衛邊疆。

開皇十九年（599年），高穎、楊素擊突厥玷厥（西突厥達頭可汗），大破之。文帝拜染干（突利）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帝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眾<sup>31</sup>。隋文帝因採納「鋤強濟弱」之策，透過和親，不但可以先讓弱者自安，而且得以均衡東西突厥勢力，讓西域北荒諸汗國因依賴大國隋朝，透過「和親」，建構「夫婦之邦」而形成

25 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起源—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吳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頁120-125。張啟雄，〈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宗藩體系」對「殖民體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9，2013年3月，頁47-86。

26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11324。

27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11324。

28 《隋書》，卷五一，列傳十六〈長孫晟傳〉，頁1333。

29 《隋書》，卷八四，列傳四九〈突厥傳〉，頁1872。

30 《冊府元龜》於此處之人物敘述，頗為混亂。按：處羅侯乃沙鉢略可汗之弟，依沙鉢略遺言立為葉護可汗，後隋文帝冊封其為莫何可汗；莫何可汗（處羅）之子為染干，在都蘭可汗之後，繼位為突利可汗，其後隋文帝冊封其為啟民可汗。另雍虞閭乃沙鉢略可汗之子，即都蘭，繼處羅侯之後登位為葉護可汗。至於，染干乃沙鉢略大可汗之弟處羅可汗之子，即突利可汗，其後隋文帝冊封其為啟民可汗。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11324。

31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11324。

宗藩關係的「君臣之邦」，因而減少戰亂，帶來承平，以各生其活，各安其養。

由於隋文帝深知賜予和親，可以給予聯姻雙方，特別是給予對方，在國際政治上加重其天平比重，因此隋文帝對突厥的和親，大都為了穩定天下，精心安排其國際政治的權力平衡，進而做為臣服天下萬國之道，所以制衡與臣服之道，都是經過其君臣縝密思考、反復討論以及精心策畫的結果，最後才決定其和親的對象，因此在強大的國力支持下，無論對華夷和親或漢胡和親策略大都能操縱自如。所以這是和親而不是通婚，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為了勢力均衡，安定國際政局或者進而臣服敵人，統一天下，故具有政治目的。後者只是單純為了家族綿延、興旺或者發達，完成人生上的幸福生活而已。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前者看似華麗無比卻是犧牲婚姻幸福；後者看似平凡一生，卻是邁向人生幸福。隋文帝在豐沛國力的支撐之下，實行「天下一家」的和親政策，安排中華世界秩序，以讓天下回歸承平，因此被突厥尊稱為「聖人可汗」，為兩漢以來之天下共主的最高尊號。

#### 四，隋煬帝建構的至尊可汗型夫婦之邦

煬帝大業三年（607年），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疋。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啟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月〔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帝乃親幸啟民所居，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官名，掌理邦交軍國大事，大都以可汗子弟充任〕，以下各有差。隋煬帝所以恩威並加，所要的就是「跪伏甚恭」的「恭」字，跪伏用以表恭，恭用以表誠。蓋外示恭順，內存誠意，則天下太平，故賞及隨從子弟官員。由上可知，隋煬帝雖然好大喜功，卻也有國際政治長才，在前代累積的國力下，臨御突厥，而被尊稱為「至尊可汗」，也是繼隋文帝「聖人可汗」之後，兩漢以來之天下共主的最高尊稱。

明年，啟民卒，子始畢可汗立，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在收繼婚制下，延及唐初始畢死，處羅可汗立。處羅死，黠利（頡利）可汗立，並妻（公）主焉。煬帝四年，高昌王伯雅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年中與其弟闕達設及特勒〔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煬帝於十年正月，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突厥高曷娑那可汗，賜錦綵袍千具，綵萬疋。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sup>34</sup>和親在隋朝，一直都扮演著羈縻突厥結親以收臣從的角色，突厥也樂於為隋朝效命，馳騁天下，鎮壓叛亂，成為隋朝安撫天下的得力姻親藩屬。

總而言之，隋文帝勤政愛民，因恩及北荒胡人，故被尊稱為「聖人可汗」，而隋煬帝也在前代累積的國力之下，臨御突厥，恩威並濟，同樣的，也被尊稱為「至尊可汗」，而且受到讚譽，稱「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以臨御天下。其中，尤以「養活臣及突厥百姓」，而且「實無少短」，最為重要，可謂與衣食父母無異，實現了隋厥「共生共榮」的境界，可見隋朝待遇啟民可汗之厚，因而贏得「跪伏甚恭」的尊敬。由此可知，隋煬帝在外交上也確能克承其父文帝

32 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 11324。

33 《舊唐書》，卷一九四下，列傳第一四四下（突厥下），（台北：鼎文書局，1980），頁 5180。

34 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頁 11324-11325。

之外交功業，具經營國際政治之長才，開兩漢以來天下共主因功業而備受草原民族尊敬，經日積月累致其汗位之尊號也不斷提昇。此時，由「聖人可汗」經「至尊可汗」，邁向「天可汗」之華夷漢胡之天下共主的國際地位僅一步之遙，惟欠東風而已。

不過，若以犧牲婚姻來成就安泰天下的和親公主而言，歷代公主所不能適應的習俗，乃胡人有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收繼婚制，父死則「子妻群母」（生母除外）之陋習，將「群母」視為「財產」，而不是將其視為生命主體的「人」，一併加以「繼承」。就往例而觀，此時和親公主無不因文化衝突，而「上表請歸」，以拒絕「亂倫」婚姻。惟匈奴、突厥等西域北荒民族，亦循例上表「請尚公主」或「妻公主」，天子或中國皇帝，為了安撫戎狄，安定天下秩序等政治考慮，亦基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以不治治之論〉的「因俗制宜」，無不循例下令「詔從其俗」，委曲其親生子女或宗女的「公主」須「入境問俗」。從隋朝天子來看，甚至君臣民來看，這不但是其所治天下基於〈以不治治之論〉的統治原理，所行之「民族自治」，也是「地方自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和親」公主，因此成為永駐異域的「終生大使」、「親善使節」。

## 五、結 論

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突厥因南下建立汗國，與新建王朝隋朝對抗。其後，突厥分裂成為東西兩汗國。東突厥沙鉢略可汗位於隋朝北境，西突厥達頭可汗則在隋朝西北方。隋文帝掌握東西突厥的對抗契機，企圖利用和親政策，聯合東突厥沙鉢略可汗，以對抗西突厥。同樣的，東突厥沙鉢略可汗也為了對抗西突厥，企圖利用和親，以聯合隋朝對抗西突厥，進謀稱霸突厥，遂在國際政治上暴露可乘之機。對以突厥為首的西域北荒戎狄而言，「和親」就是情誼的象徵，既可轉為聯手抗敵制敵的盟友，於是「和親」就成為隋朝－突厥間的結盟工具，扮演媒介國際政治之力量分合的重要角色。

於是，沙鉢略可汗乃以和親為名，請尚千金公主。他以「皇帝＝婦父」，「可汗＝兒例」之「君父 vs. 臣子」的名分秩序，致書隋文帝，強調「羊馬 vs. 繒綵」等物資互通有無，並且在財富上不分彼此＝「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vs.「彼有繒綵，都是此物」，甚至在感情上強調「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以培養中厥雙方之互賴互信，透過「重疊親舊」，以傳諸「子子孫孫，終不違約」，形成具東方特色的階層性「天下共同體」。

隋文帝也以「和親」為基礎，強調大隋天子既是沙鉢略可汗之「婦公」＝「妻父」，也視可汗如子。基於家族倫理，在「常使」之外，還特別派遣「專使」代表家族探望「女兒」，並因愛屋及烏也探望女婿＝沙鉢略可汗。隋朝與突厥雙方，因遵循〈夫婦倫〉的「倫理」與「典範」，而形成「夫婦之邦」的典型範例。顯然，隋文帝深刻了解周遭異族之思維與生活方式，故能應對自如且游刃有餘。於是，寵之以「和親」，以便將突厥納入隋朝所安排〈五倫國際關係論〉之下，〈夫婦倫〉秩序體制之中，形成以隋朝為天下中心的階層國際秩序體制。

由於「翁婿之邦」的感情彌篤，故突厥沙鉢略可汗對隋文帝楊堅執禮甚恭。在國際政治上，雖以「可汗 vs. 皇帝」之對等頭銜相稱，但是在「皇室」的家族倫理上，則以「夫婦之邦」的〈夫婦倫〉為本，以子婿自居，而尊稱婦父為翁，形成「翁婿關係」＝「女婿 vs. 岳父」，且希望子子孫孫，親上加親，直到永遠。在國際經濟上，突厥對雙方物資表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故強調羊馬繒綵，互通有無，在翁婿分治的天下，出現類似「財經共享、互通有無」的烏托邦理想。隋文帝雖以「大隋天子」對「大突厥沙鉢略可汗」的對等稱號稱呼突厥可汗，但以「婦



公」=妻父自稱，視「沙鉢略可汗」為「兒子」，二國關係如一家之親，而時遣特使「看女，復看子婿」，讓雙方綿綿情意，化天下為一家。透過「和親」，將他國納入己國的「家族倫理」秩序之下，形成「夫婦之邦」的天下型國際關係，進而應用〈夫婦倫〉之「倫理」規範天下，以形成良性循環之古典國際關係，此實為今日西方國際關係所不及之處，譽為國際關係之「典範」，亦非過言。故「天下一家」的國際關係，就是建立在具有「倫理」與「典範」的觀念下，所形成的一種較為人所熟知，且容易遵循的國際規則，而轉化成為良性循環的國際關係，而「倫理」就成為今日國際關係首須借鑑參酌的典範。

隋文帝在豐沛國力的支撐下，實行「天下一家」的和親政策，安排中華世界秩序，以讓天下回歸承平，因此被突厥尊稱為「聖人可汗」，為兩漢以來天下共主的最高尊號。隋煬帝在國際關係上，也克承父業，頗受突厥讚頌，稱「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隋煬帝雖然好大喜功，卻也有國際政治長才，在前代累積的國力下，臨御突厥，不但能召集四方君長至中原朝貢，甚至養活突厥君臣百姓，而形成一種古典、包羅華夷的「隋厥共同體」，甚至開創「天下共同體」的雛型，故突厥尊其為「至尊可汗」。

總而言之，隋朝二代，文帝勤政愛民，恩及北荒胡人，故被尊稱為「聖人可汗」，而煬帝也在前代累積的豐沛國力支持下，臨御突厥，恩威並濟，同樣的，也被尊稱為「至尊可汗」，是繼隋文帝「聖人可汗」尊號之後，兩漢以來之天下共主的最高尊稱。其中，尤以「養活臣及突厥百姓」，而且「實無少短」，最為重要，因此即「隋厥共同體」或「天下共同體」之實質內涵，實與衣食父母無異。可見，隋朝待遇啟民可汗甚厚，才能贏得「跪伏甚恭」的果實。由此可知，隋煬帝在外交上，也確能克承其父文帝之功業，具經營國際政治之長才，開兩漢以來天下共主因功業而備受草原民族尊敬，在日積月累下，汗位尊號始能墊高，往上提昇。因此，後世的唐太宗才能站在隋朝二代苦心耕耘的成果上繼往開來，以「聖人可汗」加上「至尊可汗」的政績基礎，創造出史無前例之「皇帝天可汗」的榮銜與華夷共存共榮的「天下共同體」。最難能可貴的是，「天下共同體」乃基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以不治治之論〉的「因人、時、地、俗、教制宜」而形成「民族自治」、「汗國自治」、「地方自治」。在「聖人可汗」與「至尊可汗」的苦心經營下，隋朝開出「隋厥共同體」的花朵，唐朝結了「皇帝天可汗」之「天下共同體」的果實。其中，「和親公主」扮演著連接華夷「天下共同體」的臍帶角色，成為永駐「天下共同體」之「周邊自治體」的終生大使。